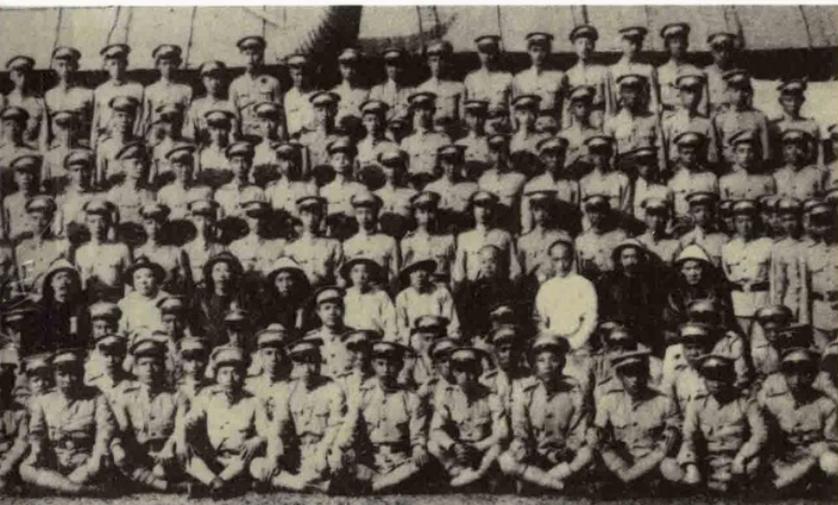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美] 石约翰 著
王国良 译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中国革命的
历史透视 (第2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美] 石约翰 著
王国良 译

中国革命的 历史透视 (第2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 (第2版) / [美] 石约翰著; 王国良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7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ISBN 978-7-300-14003-2

I. ①中… II. ①石…②王… III. ①中国历史-史评-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5892 号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 (第2版)

[美] 石约翰 著

王国良 译

Zhongguo Geming de Lishi Tou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7.75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3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

——译者序言

当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已经结束之时，我们回顾中国近现代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也许会不约而同地赞道：“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我们欲更具体地概括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征，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也许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特征就是“革命”，以致有人用数次“革命高潮”来描述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或干脆将其称为“革命史”。确实，在近现代较短的 100 多年时间里，无论是革命爆发的次数、规模，还是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迈历朝历代，并且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也许只有 1789 年开始的法国革命历程差可比拟）。

毫无疑问，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受到近代西方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正是西方用贸易和武力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才迫使中国从此走上痛苦的、脱离传统模式的发展变革的不归之路。美国的费正清学派用“冲击—回应说”来概括近代西方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从强调西方社会对近代中国的强势影响方面说，确实不无道理。虽然有“西方中心论”之嫌，但此时西方的影响浩浩荡荡，确有“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之势。更重要的是，晚近先进的中国人甚至主动地到西方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希图借助西方的文化理想、理论体系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并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从此开出落后国家通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革命事件，几乎都受到相应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影响。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背景，有人才提出“西体中用论”。当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方社会和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近现代革命进程的指导作用不仅无人否认，而且几乎被看作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向前发展、取得革命成功的主要动力了。在这

样强势影响的背景下，一个本来需要人们严肃认真地进行思考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却被人们忽略了、遗忘了。这个问题就是：尽管近代西方社会和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影响，对中国近代革命变革有推动作用，但近代中国的革命变革是否主要出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原动力是否依然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

自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界逐渐发展出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即每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遇阻受挫，人们总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在起阻碍作用，因此要进一步清除传统文化因素，全面引进西方文化。仿佛是减得一分传统文化，方入得一分现代化。由于长期受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当然还有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禁锢，人们几乎想不到要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求近代革命变革的原动力，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关系是相互脱节、断裂的，还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连续体的关系问题。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时，在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退色，人们逐渐摆脱五四以来的思维定式，摆脱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起支配作用的、从外部引进的理论分析模式之时，思考这一重大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而适逢其会了。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中国近代社会会如何发展呢？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分析框架的人们所提出的传统见解认为，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问题在于，“缓慢地发展”需要多长时间？300年抑或是500年？“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还需进一步澄清，因为事实证明，商品经济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否则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就应该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远远落在荷兰、英国、法国之后了。至少在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的许多学者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肤浅了解，把中国社会看成基本陷于停滞状态的落后社会，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曾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很大影响的黑格尔。身处近现代之交的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通过

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考察，特别是对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的考察，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没有产生能够促使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宗教伦理”，因而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理性资本主义道路（尽管中国现代化事业启动之时，并没有引进韦伯所述的“新教伦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推动和影响，至少中国很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美国布兰代斯（Brandeis）大学历史系教授石约翰先生（John E. Schrecker）却不同意这些看法，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一书中，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近200年革命历程与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历史关系的考察，通过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演变作理论上的综合理解，认为中国近代向西方求索借鉴之理想就是中国社会中已丧失的、长期被遗忘的传统。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冲击与影响，激活、唤醒了中国业已遗失的传统。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石约翰先生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20世纪的许多史学工作者，运用主要与欧洲社会相适应的西方史学理论模式来阐释中国社会历史，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强行纳入欧洲社会发展模式中，认为中国社会也必然经历作为普遍规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并进而到达社会主义社会。运用这种分析框架确实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但也留下一系列史学难题，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何如此漫长的问题就始终困扰着史学界，由此而产生解释其原因的“超稳定结构说”。在社会如何向新阶段过渡的问题上，近年还衍生出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之猜想的论证。看来，如何理解封建社会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石约翰先生的探讨正是从对“封建”术语的不同理解开始。如果我们抛开西方史学分析模式，运用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也许更能接近中国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历史理论中，有两个重要范畴：封建和郡县，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先后两个社会发展阶段。传统史学家普遍用这两个范畴来理解中国历史。在封建制度下，社会不是由国王直接统治，相反，是由世袭的地方贵族以分权的形式进行统治，这些贵族被授予一片封地由其治理；郡县社会则是由中央集中管理，国家划分成若干行

政区域，通过由君主直接任命的官僚进行治理。封建社会有一个世袭贵族集团，等级森严；而郡县社会有一个以财富、才能和教育程度为基础的精英士大夫集团，是相对开放的社会体系。此外，二者还有如下区别：首先，封建制度对于土地、劳动力、产品的出售有严格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限制，在郡县制度中，这些物品的出售有相对的自由。其次，封建制度具有军事尚武精神，郡县社会则具有市民的或商业的观念。最后，封建秩序在意识形态上有很深的宗教的和唯灵的气氛，而郡县社会却趋向于人文的、世俗的精神。概而言之，封建意味着贵族的分权，等级森严，没有自由市场，具有军事和宗教价值观。

根据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封建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时大约延续了1000年时间，即从公元前1700年至前500年，相当于殷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西周，是比较典型的封建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从封建社会向郡县制过渡，秦王朝的统一初步完成了这一过渡，达到郡县制的第一个高峰；从汉代开始封建制再度复活，从汉朝到唐朝是郡县制与封建制交替并存、互为消长时期；到宋代郡县制再度占据主流地位，达到郡县制的第二个高峰，封建制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宋元明清是郡县制的全盛、成熟和走向衰落时期。

石约翰教授根据封建制、郡县制来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至少有以下几点长处：一、这种划分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二、这种划分使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变得清晰明白、流畅自然；三、这种划分使从中国内部寻求变革的源泉动力成为可能。由此看来，与欧洲封建社会“Feudalism”相对应的中国封建制，至少到唐代已开始终结，此后约1000年的历史属于郡县制。当近代西方势力开始冲击、影响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郡县制的全面衰落时期，郡县制的各种痼疾弊病已充分暴露，不足以应付全新的世界大变局，中国社会内部已开始探寻新的发展方向，酝酿新的变革，在探索走出郡县社会的道路。

早在明清之际，被称为启蒙思想家的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已开始激烈抨击郡县制的弊端，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封建时代，试图汲取封建制的精华以补救郡县制的缺陷。黄宗羲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原法》），因为三代以上之法乃天

下之法，非“为一己而立”，三代以下之法乃“一家之法”。顾炎武说：“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顾亭林诗文集·郡县一》）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探索由于满族政权的高压统治而被迫中断。我们今天可能对他们探索的复古倾向不感兴趣，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英国的议会民主制正是起源于贵族政治。而且，他们对中国近代改革派人士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梁启超曾这样说：“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9页，北京，中国书店，1958）

石约翰教授还大胆作出挑战性尝试，第一次以中国封建、郡县的历史发展轨迹为参照系来观察欧洲历史发展，认为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即我们通常认为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和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这一过渡时期到18世纪大体完成。因此，当东西方在近代相遇相撞时，西方恰恰是以新兴的郡县国家的面目出现的。此时的郡县国家去古未远，仍然保留着封建时代富有生气的遗产，如贵族的分权体制、军事尚武精神以及宗教价值观等等。国外史学界往往持“日本社会特殊论”，认为日本虽为亚洲国家，却属于欧洲国家社会类型。实际上，这种“特殊”纯粹是一种巧合，即当日本步入近代之时，刚刚借助外力推动完成由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过渡。近代中国的激进改革派想从西方吸收引进的主要就是封建制的生气勃勃的遗产，这些遗产又是中国长期丧失的传统。

石约翰先生的这种阐释虽不乏新颖有趣之处，但许多人可能仍有牵强附会之感。确实，在西方的语汇中找不到与“郡县”对应的词，也曾使作者颇费踌躇（与“封建”对应的词是“Feudalism”）。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近代革命所要破坏和反对的是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或者说主要不是封建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也都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地漫长。

如果我们顺着作者的思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就不难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前期与郡县中国社会有许多共同特点，如中央集权、相对开放的市场、市民商业观念以及人文价值观。近代维新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也持有这种

看法。然而，近代西方社会与郡县中国还有许多不同的特点，除了一个处于兴盛期、一个处于衰落期之外，郡县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技与近代工业，在比较史学意义上始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近代中国革命不仅是要追求在集权与分权之间达到平衡，以及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推进国家科技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当近代西方列强的势力已经拓展到全球，当西方营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开始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命脉之时，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工业如果不谋求国家政权的支持与保护，就很难与带有侵略性的西方经济力量相竞争。如果衰落、腐朽的国家政权不能维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反而受到西方列强的控制，也许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通过革命，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再借助政权的力量，维护、支持、推动国家科技工业迅速发展，这正是中国一次次革命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也是近代中国寻求走出郡县制的新发展之路。而且，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尚未成熟到足以独立地应付国际竞争环境的挑战时，就不能削弱国家政权的功能。

中国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国度。细察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不难发现，使中国变成今天面貌的革命，与中国古代革命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不仅仅是西方经验的副产品。

传统“大同”理想构成支持中国革命的思想资源和背景。“大同”理想的经典表述出于《礼记·礼运》篇，一般来说体现了原始儒家的社会理想，但也具有鲜明的百家融合的背景，主要是受到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的强烈影响。大同理想的内容可概括地表述为：人们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天下为公，世界太平。大同理想最初似乎是对与氏族时代相联系的远古理想社会的描述，但在中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大同主要还是作为未来的社会理想而同时为历代志士仁人和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认同。每当内乱外患产生，社会危机爆发，大同理想就作为批判现实社会和引导革命的参照系而浮现出来。在中西冲突的近代也同样是如此。无论是洪秀全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太平天国革命、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还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理念，都可以感受到传统大同理想的巨大回响。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支持认同，恐终难获得成功。当然，中国大同学说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充实新的内容。

中国古代历次革命之出现与获得成功，往往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不满抗议精神和广大民众的暴动、起义成功结合的结果。中国近代革命历程也同样在昭示了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与包括工人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武装起义的汇合。特别明显的是，没有农民主力的参与，革命就难以最终成功，这恰恰是中国革命的传统特点。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革确实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其影响之深，导致中国社会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回应。但从近现代革命历程的原动力方面看，即中国社会内部对新发展道路的寻求、思想资源以及社会力量方面看，它与中国前近代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现代化进程之所以没有陷入类似“百年孤独”的困境，实有赖于中国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的支持。石约翰教授也指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长期以来就蕴涵着激进的反对派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五四一代思想家反传统文化的立场与姿态，也无意中贬低了中国本土的反对派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的价值，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完全遗忘了这些传统的存在以及在现代的变相的延续。当今中国正处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国正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时而平缓、时而激进的反传统浪潮之后，认真清理分疏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赓续传统，融会新知，来应付当代生活提出的各种挑战，也许就是21世纪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之一。从这一维度来看，我们有理由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一书作积极评价。

王国良

2010年6月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美]石约翰.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016.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